

灿烂文化

中国近代 学校教育

白光耀 编著



0.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学校教育

白光耀 编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白光耀编著.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1

(中国历史知识全书)

ISBN 7-5304-1663-4

I. 中… I. 白… III. 教育史-中国-近代 N. 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1605 号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瑞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625 印张 100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一版 199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3.9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中国历史知识全书》丛书之一。教育事业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但是在近代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和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教育事业也处于落后世界先进国家的可悲局面。中华民族的一些优秀人才,立志于兴办新式学校,倡导新式教育,书写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光辉篇章。此书向中小學生、青年朋友讲述了这段历史史实,以丰富读者的历史知识。

G529.5
4
2

中國歷史知識全書

李錫銘

1006/08

中国历史知识全书

主 编: 朱仲玉

副主编: 曹坎荣 解 锺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马小奇	王东全	王明泽	邓瑞全
刘贵芹	刘淑英	白光耀	史革新
田和珍	许 华	朱大平	朱昌彻
阎春红	汪受宽	杜永菊	李东生
李志英	陈卫平	陈霞村	张文朴
张式苓	张承宗	张福裕	林晓平
范瑞祥	孟庆荣	闻惠芬	胡逢祥
赵敬寰	赵籍丰	郭玉兰	郭齐家
郭英德	贾卫民	章义和	梁 晔
谢俊美	靳生禾	郑一军	

前 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十分悠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外来的侵略势力和内部的腐朽统治奋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了无数受人敬仰的英雄豪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创造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灿烂的成就，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中国历史的发展既然如此丰富多彩，每一个中国人自然很有必要学习自己祖国的历史。通过学习历史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进而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祖国的统一、繁荣富强作贡献。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学习祖国的历史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学习祖国的历史能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今年八月，中央宣传部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把进行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教育和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出这些都是向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正是为了发掘这宝贵的资源，我们编辑出版了这一套《中国历史知识全书》，目的就是想让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广大读者、尤其是青

少年,能掌握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历史灿烂辉煌的一面和受过挫折屈辱的一面,从而给爱国主义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为谱写中国历史的新页下定决心。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业,相信定会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初步拟定了包括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灿烂文化、辉煌科技四个毓的 50 个选题先行出版,希望能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反映中国历史的主流与特点,使读者能从中认识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并了解其发展规律。以后还将根据需要,陆续加以补充和完善。

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预定目的,欢迎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与建议。

· 《中国历史知识全书》编辑委员会

1994 年 11 月

目 录

一、同文馆——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开端·····	(1)
二、太平天国的教育改革·····	(17)
三、早期的教会学校·····	(31)
四、我国的首次留美活动·····	(43)
五、从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到北洋大学堂 ——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学的诞生·····	(59)
六、台湾的差别教育·····	(77)
七、“壬寅——癸卯学制”——中国近代新式学制 系统的建立·····	(85)
八、退还庚款兴办教育——清华学堂(清华学校) 的诞生·····	(96)
九、民国初年教育的嬗变·····	(103)
十、“壬子癸丑学制”——民国第一个学制·····	(116)
十一、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中国高等教育的 真正变革·····	(129)

一、同文馆——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开端

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为了适应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涉以及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兴办了一批学习“西文”（即外国的语言文字）和学习“西艺”（即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的新式学堂，用以培养洋务人才。其中同文馆（即外国语学堂，它又包括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在此主要指京师同文馆）就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学习“西文”的新式学堂，是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开端。

（一）同文馆创立的背景

清朝的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非常严重。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统治阶级进一步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又严重地威胁到了清政府的统治。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形势，清政府内部产生了一部分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为我所用的洋务派官僚，从而掀起了一场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洋务派官僚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不懂外国的语言就无法与洋人进行交涉。更主要的是，随着清政府与各国外交事务的日益增多，清政府急需培养大批能精通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出任翻译，帮助政府办理外交事务。尤其是《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条约都用英文，仅在 3 年之内可以附

用汉文。因此，恭亲王奕訢在1861年1月上奏皇帝，建议在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慧之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他在奏折中说：“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从前俄罗斯馆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久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飭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培养“通事”和“译员”已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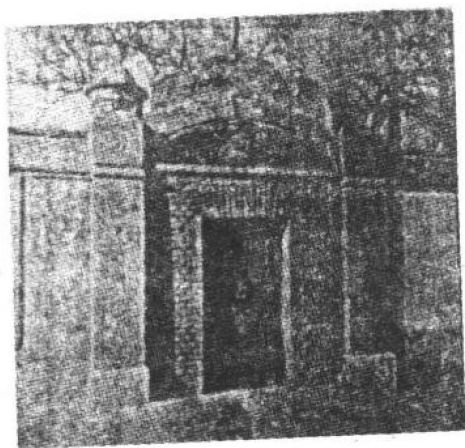


图1 京师同文馆旧址

(二)同文馆的创立和发展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正式批准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命奕訢为总理衙门大臣。同日，上谕准许设立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创办。后因广州、上海没有送来教习，未能按时举办。奕訢不得不延请外国人充当教习。最后由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介绍了兼通汉文的包尔腾任英文教习。包尔腾的薪金，第一年（其实仅6个月）为300两，第二年为1000两；汉文教习的薪金为每月8两，年薪96两，较之外国教习相差甚大。1862年6月，同文馆正式创立、开学。

同文馆创立之初，学生只有10名，全是13~14岁的八旗子弟，学习英文，为英文馆。1863年，奕訢又奏请设立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因为最先与中国订立条约的就是英、法、俄三国）。

1867年6月，奕訢等又奏请设立了天文算学馆。招收20岁以外科举出身的正途官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从此，同文馆的学生不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并且还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可以说，天文算学馆的成立是中国正式把西方自然科学作为教学内容的开始。自此以后，同文馆已不再是初级的外国语专科学堂，而变成一所综合性的学校，标志着科学开始渗透于传统的教育之中。1869年，清政府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即教务长），从此，才有了总管同文馆校务的人员，课程也有了较大的改进，增加了许多应用学科。1872年，同文馆添设了德文馆。1873年，同文馆附设了印刷所，并备有中文活字和罗马体活字以及手摇印刷机

7台。同文馆师生翻译的书籍和考试卷等都在此印刷,同时也为总理衙门印刷文件。1876年,同文馆制定了“八年课程计划。”同年又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有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实验设备和实验教学,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到1887年,同文馆学生已增至120人。1888年,又建立了天文台和物理实验室。1896年,又增设了东(日)文馆,学习日文。

(三)洋务派和顽固派在同文馆问题上的争论

从同文馆创建开始,就遭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责难和非议。顽固派认为让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奇技淫巧”,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轮船租赁,洋炮购买,既便且省,“何必为此劳绩?”,举办同文馆为不急之务;“舍中法而从西法为非”;“师法西人为耻”。另外还认为“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以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此皆不识时务”之论,对以上几点逐一进行驳斥,使同文馆能得以继续创办下去。

随着洋务派官僚在各地开办工厂,制造轮船和枪炮,开始逐渐认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他们认为,欲改变当时中国武器落后的状况,学习西方的制造技术,必须先学习西方的基础理论。奕訢说:“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又说:“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创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以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徒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他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制造出坚船利炮,“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因而,1866

年12月,奕訢等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最后,奕訢的请求得到了清廷的认可。这样,同文馆不仅在学习内容上有较大的变化,而且招生条件也因之而与学语言文字者有所不同。一是“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二是招取“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奕訢等洋务派官僚的这一措施是一个大胆而又坚定的改革。生源从八旗幼童改为“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和“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的满汉各官”;年龄从十三、四岁改为20岁以外。很显然,这种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的新型人才马上可以肩负重任,加强对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一个值得嘉许的在培养人才上的大跃进。但是,洋务派的这些措施却又遭到了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官僚的反对和攻击。攻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招收正途有功名者入馆学习天文算学一项。

以山东监察御使张盛藻打头阵。他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若令正途科甲人员学习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他认为天文算学馆“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少年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张盛藻的这种顽固守旧观点,在一片办洋务的热潮中,必然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朝廷也给予否定。但是,倭仁并不甘心,仍竭力争辩。他除继续申述张盛藻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那些陈词滥调之外,着重渲染“师事夷人”的危害。他说:用“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它将于“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而且,“夷人吾仇也”,“师事夷人”即为“事仇”,其罪大矣。如果实在需要天文算学人

才，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众多，“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奕訢等针对倭仁等人的攻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在关于招收正途出身的学士大夫入馆学习天文算学问题时，奕訢指出原因有二：一是正途出身人员均为“读书明礼之士，存心正大”，学习西学不至于“不加拣择”，被“洋人引诱误入歧途”；二是学士大夫对今日局势均痛心疾首，均有如倭仁所说的“夷为吾仇”的心情。他们“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他认为当今之局势，只有设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创办和发展轮船航远、机器制造等工商业，国家才能自强。如果倭仁等另有富国强兵之良策，“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祷昧，悉心商办。”如果别无良策，仅以忠信礼义之词空谈富国强兵之道，则“臣等实未敢信”。至于倭仁所说中国亦有此种人才，那很好，“内外臣工先后二十余年所求而弗获者，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不胜欣幸。”“请旨飭下倭仁酌保数员，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飭以观厥成。”可是，当清廷真的下旨飭倭仁照此办理时，倭仁只好认输，说：“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前议不过“以理度之”而已。可以说奕訢的反驳是非常有力的，它击中了倭仁的要害，使倭仁等不得不哑然无声，自认理输。经过洋务派与顽固派两个回合的论争，招收正途人员入天文算学馆学习之争，总算告一段落。

可以看出，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关于同文馆问题上的论争，是革新与守旧之争，是学习、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与坚守落后生产力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不管是洋务派官僚，还是顽固派官僚，他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他们都主张“中学为体”。但从社会发展来看，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的。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的观点是要使中国永远按照传统的典章法规去做,不敢革新,眼看着中国的灭亡而束手无策;而以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则是面对现实,大胆改革,使中国由落后逐渐走向富强。我们不能因为奕訢等洋务派站在维护统治阶级反动专制统治的立场上,而一概否认其变革的进步性。历史上的许多人物,为了维护反动统治而采取必要的变革手段,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向前发展。我们对其应给予公正的评价。

通过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同文馆问题上的论争,进一步说明了同文馆的创建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巨大冲击,也说明同文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开端。

(四)同文馆的教习与馆政

按照奕訢等奏设同文馆时的设想,同文馆的教习并非聘请外国人担任,他主张先由上海、广东两处保荐通外语的人担任,后因各地无法推荐,才聘请外国人担任教习。同文馆总计聘任教习有多少,尚无确切统计。据1898年刊出的《同文馆题名录》,前后总计约近百名教习,外籍教习约占80%。但在同文馆创办初期,中国教习仅有两名,一是汉文教习徐澍琳;二是算学教习李善兰,其余约十六、七名均为外籍教习。同文馆各馆创办时第一位教习为:英文馆为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法文馆为荷兰传教士司默灵;俄文馆为俄国驻华使馆翻译柏林;德文馆为俄文、德文教授第图晋;算学馆为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东文馆为日本人杉几太郎。

同文馆的馆政，直接隶属于总理衙门管理。凡有重大事件，均由奕訢奏呈皇帝。为了加强对同文馆的管理，总理衙门各大臣不仅兼任同文馆的总管大臣，还任命有专管大臣和监察官。1867年2月，奕訢奏请派太仆寺卿徐继畲(shē)为总管同文馆大臣。当天，上谕就任命“太仆寺卿徐继畲，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著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充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并且还进一步指出：“惟寺务恐难兼顾，著开太仆寺卿缺，以责专成，而资表率”。当时派徐继畲任总管大臣的目的是因为各馆大多为洋教习，只有两名中文教习，而天文算学馆的学生又均为科举出身。因此，“必须有群情宗仰之一人，在彼指引开导，庶学者有所秉承，否则该馆只有洋人讲贯，而中国无师表之人，恐来学者竟疑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未免因此裹足”。另外，还设有监察官，由掌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充任，以头品顶戴布政使衔管理控制同文馆。赫德主要是监管同文馆的财务，经费由海关税务司的船钞中拨付。同文馆的外籍教习，多数是赫德从海关总税务司聘请的。同文馆还设提调二人及帮提调二人，主要职责是“掌经理训课及督察生徒勤惰之事”。

同文馆建馆初期，各馆是分立的，教习分属于各馆，没有设总教习一职。1896年，赫德介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同文馆的总教习，这可以说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正式校长。丁韪良担任同文馆的教习以后，实际上他掌握了同文馆的教育权，加之赫德操纵了同文馆的财政、教习任职大权。可以说，同文馆实际上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控制之下，这与洋务派的初衷是不一致的。丁韪良曾经形象地说：“在大学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